

主編 李天綱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民國西學要籍漢譯文獻·心理學（第二輯）

Psychologie des Kindes

兒童心理學

〔德〕高五柏 (R. Gaupp) 著 陳大齊 譯



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心理学（第二辑）

Psychologie des Kindes

儿童心理学

〔德〕高五柏（R. Gaupp）著 陈大齐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儿童心理学/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心理学)

ISBN 978-7-5520-1766-3

I. ①儿… II. ①李… III. ①儿童心理学 IV. ①B8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139号

儿童心理学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14.5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766-3/B.175

定价: 78.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

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 1773 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 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

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

续 1930 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 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

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

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德] 高五柏 (R. Gaupp) 著 陳大齊 譯

兒童心理學

中華民國十三年初版

序

本書爲德國刁平根 (Tübingen) 大學教授高五柏 (R. Gaupp) 所著, 原名 Psychologie des Kindes, 爲 Aus Natur und Geisteswelt 叢書中之一。譯文根據原書第四版(1917)。第四版的序裏邊說道: “第四版著了新裝出現。沒有一章與前版相同, 有許多章是完全新著的”。所以原書第四版可說是一九一七年的新著, 和前三版實在沒有多大關係。高五柏本是一個醫學家, 但於心理學却也造詣極深。本書原是教員夏期講習會中的講演稿, 爲教員而著, 所以頗合實用。並且因爲說理明顯, 材料詳備, 所以德國教育界頗推重此書, 以爲是師範學校最好參考書底一種。本書既有實用的目的, 對於材料底取捨上, 自不能不以此目的爲依歸。所以原書第一版裏說道: “本書欲合於實用的目的, 故在材料上不能不有一種適當的取捨。因此有許多問題, 在嚴格的科學研究上應有重大意味的, 如空間知覺底成立等, 本書不大講到; 而專門心理學家或所視爲不大重要的問題, 本書反討論較詳”。原書底序

文本極簡單，不過略述著書和出版底經過，並著書底要旨；譯者因其無關重要，除把著書底目的在上面譯述外，統統略去不譯了。又原書尚有附錄：精神異常的兒童一篇，因譯本爲本叢書字數所限，所以也只好割愛不譯。原書底價值如何，譯者不欲過事稱揚，願一任讀者底評衡。但譯者始終堅信，在中國這樣寂寞的出版界中，這樣饑荒的讀書界中，本書出現，總多少有點可以貢獻，似不至於完全成了一回“災梨禍棗”的把戲。至於本書譯文能否把原書底精神和價值顯現出來，這確是一個很大的疑問。譯書真不容易！譯界前輩提出了信，達，雅三條原則。我們現在譯書，既用白話，則前輩之所謂“雅”，我們當然用不到遵守；但信達兩事，無論用白話來譯，或用古體文來譯，都很重要，不可不設法完成的。達而不信，等於自著，信而不達，等於不譯。然中西文法相去這麼遠，又要信，又要達，真不容易——信了便不易達，達了便不易信。完全直譯，則易信而難達，完全意譯，則易達而難信。又信又達，非有極大技巧的人，必難做到。譯者自恨 沒有這種技巧，所以不敢妄有此種希冀，但求信而不過於不通或達而不過於失却本來面目，則我的志願便算已經達到了。因爲要副此志願，所以譯文

遇到不易達的地方，不免犧牲一點信，遇到要保全信的地方，不免犧牲一點達。故書中不免有不甚通順的句子，初見似不可理解；但譯者妄信，讀者若能細心體會，似尚無全不可解的句子。“底”，“的”，“地”三字底用法，從前有許多學者討論過，譯者於國語學素少研究，對於這種討論實在不敢妄贊一辭。但從譯書底實用上看來，三字分用，可以得着許多方便，所以本書便採分用主義——“底”字用在兩個名字底中間，“的”字用作形容字底語尾，“地”字用作狀字底語尾。至於這種用法究竟對不對，譯者不敢妄斷，倘然果能因此使讀者比較地容易瞭解譯文，則譯者底試用便算不枉費心力。

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陳大齊識於北京

目 錄

導言	1
兒童心理學小史	3
兒童心理學底研究法	8
兒童時代底分期	16
I. 幼兒期	18
1. 乳兒底精神生活	18
2. 幼兒底精神發展	40
運動底進化 感官底機能 睡眠 記憶和注意底進化 自己意識	
感情生活底進化 幼兒底衝動 意志底進化 言語底進化 思維底進化	
幼兒底遊戲 幼兒底恐慌	
II. 小學兒童底心理	113
1. 通論	113
2. 初入學時兒童底表象界	116
3. 小學兒童底注意力和理解力	120
4. 小學兒童底記憶(學習和保存)	131
5. 陳述底心理	150

6. 小學兒童底精神作為力(疲乏學)	157
7. 小學兒童底智力發展(天資論)(智慧測驗)	173
8. 小學兒童底文字表出力	179
9. 小學兒童底趣味和感情	182
10. 兒童和藝術	185
III. 兒童時代男女的差異	200
IV. 成熟中的青年	205
索引	208
譯名對照表	209

兒童心理學

導 言

兒童心理學 (Psychologie des Kindes) 也可稱心理進化史 (Entwicklungsgeschichte der Seele oder Psychogenesis), 是兒童學 (Kindesforschung oder Paidologie) 底一部分; 人類自初生起至兒童末期止, 其間所經過的一切心理進化就是他所研究的對象。此地所說的兒童, 是指情慾成熟期以前的少年, 所以兒童心理學底研究範圍包含人生最初的十六年乃至十八年, 兒童心理學底研究, 日子還淺, 因此兒童期內的各時代還沒有同樣地經過科學的考察, 有的研究較深, 有的研究較淺, 這也是初發達的學問所難免的事情。研究醫學的人對於初生的嬰兒及幾個月或幾歲的幼兒最有興趣; 實驗心理學者喜歡分析小學兒童底精神特質, 教育學者尤其如此; 言語學者則注重言語發展時期, 所以自滿一歲起至滿三歲止是他們

所最要研究的。以經驗爲事的心理學能够做教育學底基礎，已經是極明顯的事實，所以近二十年以來，小學兒童心理學特別爲學者所熱心研究。青年期（十四歲至十八歲）心理學，最近爲青年保護制所鼓舞，也入了研究底中心點；此外又有許多人，在實驗心理學底各部門內，想研究年紀較大自省力較發達的學生。

兒童心理學底第一職務，在於考察各種年齡的兒童，以搜集精神特性上和作業上精確無誤的事實。兒童底精神生活始於何時，各種精神能力依怎樣的順序發展，自然更是重大且有興趣的問題。兒童心理學是比較的科學，所以應該把各兒童底差異和各年齡底差異明白揭示。兒童心理學又是說明的科學，所以又應該逆溯成人複雜的精神生活，求其自簡單作用漸漸向上進化的痕跡，以說明之；這條研究的道路却不是容易走的。兒童心理學又想解決一個問題：從個人底精神進化上推論出去，能否得着人類全體精神進化的斷案。因爲有這種問題，所以和民族心理學（Völkerpsychologie）很相接近，並且不能不於個體進化（Ontogenese）和種族進化（Phylogenese）之間做一番比較研究的功夫。伯來安（Preyer）曾經說過：“人類